

九一八事变后的冯玉祥

徐辉琪

内容提要 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慷慨激昂,呼号奔走,呼吁反蒋抗日,进而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揭起抗战大旗。透过冯玉祥“日记”,从历史上加以考察,这一切绝非偶然。

关键词 九一八事变 反蒋抗日 民众抗日同盟军 《冯玉祥日记》

在民国史上,冯玉祥是一个极具特色的人物。他往往能扮演一些不同凡响的角色。这固然与近代中国纷繁变化的国情有关,也与其个人的政治抱负、境遇乃至品格密不可分。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几年间,他从呼号奔走,坚主抗日,到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勇揭抗战大旗,就清楚昭示了这一点。本文拟就此作一历史考察。

—

1931年9月18日,蓄谋已久的日本帝国主义悍然挑起了对我国的侵略,挽救民族危亡严重摆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在中原大战中遭到失败的冯玉祥,正在山西汾阳的一个小山村过着隐居式的生活。但日本入侵的炮声很快把他震醒。事变后的第五天,即9月23日,他通电全国,发出了“中国存亡,在此一举”的呼声,号召全国同胞亟应猛醒,“抵抗日帝

国主义之侵略，而为正当之防御，雪此无上之奇耻”。愤然表示：“誓与全国同胞共赴国难，粉身碎骨无返顾”。^①国难当头，表现了强烈的民族责任感与决心。

随着蒋介石顽固实行“不抵抗主义”政策，日本帝国主义肆无忌惮扩大战火，冯玉祥慷慨激昂，或通电，或发表谈话，全面表达自己的愿望与主张。

矛头所指，首先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侵略本质，号召人们对日本决不能抱有任何幻想。

冯玉祥列举大量事实，愤慨指出：“自东省事变以来，寇日益深，国日益危，若不急起而速图之，则亡国之惨，可立而待。非敢故为危言以悚听，诚以日人之野心，尚未有艾，而其他列强之环向覬觐者，亦有不容忽视者耳。”^②“日本自占领辽、吉后，即竭力鼓动煽惑败类，实行独立。继见不能成功，则又怂恿自治。”“彼对我满蒙之侵略野心，已非一日。”^③“自九·一八及一·二八事变之后，日人得寸进尺，野心未尝稍戢，势非夺我全疆土，灭我全民族不止。为今之计，唯有拼命抵抗一道。”^④说明冯玉祥从一开始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就有比较清醒的认识。

其次，强烈要求蒋介石“认罪”下野。

还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首次通电，即上述9月23日通电中，冯玉祥在历数蒋介石变本加厉实行独裁政治种种行径后就提出蒋必须对日发动九一八事变承担责任，“即日通电认罪”，“听候

① 《致全国同胞电（一九三一年九月廿三日）》，《冯玉祥选集》中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651页。

② 《致熊希龄函稿（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日）》，《冯玉祥选集》中卷，第682页。

③ 《致雷中田函稿（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日）》，《冯玉祥选集》中卷，第668页。

④ 《致广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急电稿（一九三二年七月卅日）》，《冯玉祥选集》中卷，第756页。

国民公判”。并毫无畏惧表示：“直言介石，须以人民为重，君等将谓我为共党，为赤化；若言介石须早日下野，君等必将谓我为勾结外人。然为国家计，为人民计，不论君等诬我何罪，致我何刑，即用十五世纪之野蛮烈火烧我，我亦必本真理以告君等。”以后又一再发电，力促蒋介石下野，指出：“蒋氏独夫专横，自是决不肯以国家为重而自行引咎退职”，但必须“促其即日解职，免国事仍陷于不可救药之境地”。^① 解释说：所以主张“介石及国事负责者应停职待罪，国人应否认南京政府”，因为“不如此不足以与帝国主义拼死战，不如此国家又必为帝国主义之工具所骗卖”。^② 又说：“余认为救国之先决问题，厥为倒蒋。盖蒋氏数年来把持一切，厉行独裁，以造成今日之局面。若蒋氏仍不能去，则一切问题，必皆无解决之希望”。^③ 他还作了一首打油诗，痛骂蒋介石顽固坚持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诗中写道：“先剿共，先剿匪，不与日人开仗方为得。误国贼，卖国贼，不与日人开仗是为贼。日为友，敌为友，他是至死不与中国人为友。国家可给敌，不可给奴隶，前清曾经以此为口头语。”^④

当然，也应看到，刚刚经历了一场中原大战厮杀，冯玉祥对蒋介石的斥责不排除有个人恩怨的成分，以至情绪过于激愤。例如抨击说：“此次日本占我东省，皆蒋、张误国媚外所自致。”^⑤“介石

① 《致广州国民政府电稿（一九三一年九月廿四日）》，《冯玉祥选集》中卷，第652页。

② 《复熊希龄电稿（一九三一年九月廿六日）》，《冯玉祥选集》中卷，第654页。

③ 《致邓哲熙、薛笃弼函稿（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廿二日）》，《冯玉祥选集》中卷，第677页。

④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第4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1月版，第56—57页。

⑤ 《致王英函稿（一九三一年十月十日）》，《冯玉祥选集》中卷，第663页。

之政府,已成帝国主义之工具,无可讳言”^①,等等。但最主要则是不满于蒋介石的专制独裁,特别是大敌当前依然一意孤行,顽固实行“不抵抗主义”。冯玉祥曾明确表示:“只要蒋介石有六分抗日决心,以往事都可原谅他。”^②可见根本上冯玉祥是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把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的。

第三,坚决反对依赖“国联”。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打着“调查”的幌子,实行对日本采取纵容的政策。冯玉祥坚决主张抵抗日本的侵略,严厉抨击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自然反对“国联”的所谓调查。他谴责南京国民党政府:日本明目张胆挑起战端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不思亟图抵抗之方,以赎既往;乃漠然视之,不以为辱,尤为无气骨无人格之言,曰:听候国联,主张道德,主张公理。试问,中国数十年来积受帝国主义压迫之惨,国际公理究竟安在?国人稍有知识者皆知,国联组织不过一列强宰割弱小之屠场耳。危难至此,尚作梦呓,足征此等政府只能为帝国主义之傀儡,决无丝毫救国之能力。”^③愤慨说:“呜呼!宰割弱小民族之国联,能代中国求独立,能代中国打倒该会常任理事之日本乎?与虎谋皮,自欺欺人,仍甘为帝国主义之工具而不悔。”^④因此,在决定命运的历史关头,必须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如果“专恃国联,中国决难得到胜利,必须中国自己努力,方可恢复已失之权利,其他皆不足恃也”。^⑤

正因如此,当“国联”调查团到泰山游览,冯玉祥称病拒不接

① 《复熊希龄电稿(一九三一年九月廿六日)》。

② 《冯玉祥日记》第4册,第116页。

③ 《致全国同胞电(一九三一年九月廿三日)》,《冯玉祥选集》中卷,第650—651页。

④ 《复熊希龄电稿(一九三一年九月廿六日)》。

⑤ 《致雷中田函稿(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日)》,《冯玉祥选集》中卷,第668页。

见。他解释说:所谓“称病”不过是借口,“实则吾病本无若是之甚耳!吾以会晤调查团为羞,盖以不敢置信其必能秉大公至正,而解决中日问题于尽善尽当也。吾又以会晤调查团为口,盖以其从容游览各地名胜,对于正当之使命,似无多大之意义也。吾更以会晤调查团为耻辱,盖吾以四万万七千万人之国家,而不能保其领土主权之完整,人民之安全,竟至摇尾乞怜于国联会议,此而不足为耻辱,真不知天下尚有耻辱之事否。故吾始虽以病辞,实则有_尔耳”。还说:“自九一八事变后,我东北三千万同胞,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者,已二百七十余日之久,如烈火之燃眉,如磐之压身,倒悬之厄,待救正殷。而国联调查团,方优游各地,不闻其有任何积极补救之表示。倘真为负有正义人道之使命而来,似不应出此。吾早逆料其有今日,故于九一八事件发生之后,即发出数电,痛言倚赖国联之非计,以今日之情势观之,则吾不幸之逆料,以渐次证明其非过矣。”^①

《国联调查报告书》发表后,冯玉祥联合李烈钧、柏文蔚等发表通电严加驳斥,表示对“报告书”决不能“笼统之承认”。并组织撰写《反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在“自序”中进而揭露“报告书”“与其说是阴谋诡计的计划书,勿宁说是帝国主义的招供状,同时也就是我们中国的卖身文契”,不甘心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民“要毫不犹豫的否认它”!^②

第四,盛赞十九路军的英勇抵抗。

1932年1月28日,当日本侵略军把战火引向上海,以蒋光鼐为总指挥、蔡廷锴为军长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受到了全

① 《致周百 函稿(一九三二年六月十五日)》,《冯玉祥选集》中卷,第738—739页。

② 《〈反国联调查团报告书〉自序和绪论(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冯玉祥选集》上卷,第108—109页。

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对十九路军的抵抗取何种态度,一时间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中心。2月16日,冯玉祥密电陈铭枢,对十九路军大加称赞,说:该军“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争生存,有硬骨有侠气,真不愧为模范军队”。同时表示:“如有机缘,谨当追随前线诸同志之后,以为国杀贼,为民效死也。”^①又与李济深、朱培德等联名致电蒋介石,提出三项主张:“一、即派大部兵力援助上海。二、华北之兵开赴关外,武力收复失地。三、沿江各要塞同时开炮,轰击日舰。”^②但蒋介石对淞沪抗战则一味退让,并不接受冯玉祥的主张。为表示反对蒋的妥协,冯玉祥拒绝出任行政院内政部长,说:“吾人为抗日计,故只有相忍为国,力谋一致。若一旦妥协,则不仅违背向来之期望,亦且无以对国家,对同胞,对此次牺牲之将士也。惟有迅速辞去一切,以谢不敏耳。”^③当淞沪抗战最终宣告失败,冯玉祥仍对十九路军抗敌精神赞叹不已,致电陈铭枢表达说:“回忆十九路军御侮淞沪,瞻依之怀,其何能已。然先生领导革命军人,发扬民族意识,必能始终其事,则前此之战绩,亦不过光荣历史之首页耳。”^④同时对蒋介石南京国民党政府猛加抨击,例如致电蒋光鼐、蔡廷锴、戴戟愤慨说:“迩来日军野心未戢,益肆猖狂。回溯执事淞沪一战,使全国懦弱之风为之振作兴起,民族前途,正尔庆赖。乃卒不能不因援绝之故,忍痛退师,致酿成今日之势,真可为感触悲愤者也。”^⑤又如复电罗运炎,指斥说:“回溯沪战结

① 《致陈铭枢密电稿(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六日)》,《冯玉祥选集》中卷,第711页。

② 见《致张允荣、薛笃弼电稿(一九三二年二月廿一日)》,《冯玉祥选集》中卷,第714页。

③ 《致李济深密电稿(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七日)》,《冯玉祥选集》中卷,第718页。

④ 《致陈铭枢函稿(一九三二年四月廿六日)》,《冯玉祥选集》中卷,第729页。

⑤ 《致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函稿(一九三二年四月廿七日)》,《冯玉祥选集》中卷,第732页。

果,固足以振作颓风,稍杀敌焰,然假使援军早至,声势大张,则扫除淞沪,固非难事。乃有百计阻挠之者,卒使十九路军血肉换来之战绩,不得不为误国者所牺牲。”^①等等。其态度始终不渝。

第五,主张实行全民抗战。

冯玉祥一开始就认为,挽救民族危亡必须动员全国力量。他通电说:“值兹外患紧逼之时,非集中全国人民之力量,一致对外,无以救亡图存。盖外交之后盾,不仅在于武力,尤应恃民气。”^②主张必须尽快成立“真正代表民众之政府”,“此实生死存亡之最要关头,非举国袍泽以最大之决心,与最大之努力,共同赴之,不足以转危为安,救亡图存也”。^③并为此向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监委员第一次全会递交一提案,要求国难当前,“应以民众组织监督政府及军事机关并各地军队”。其要点,尽速成立全国国民救国会议及各级分会,“以纠正独裁政治之弊毒,树立民主政治之基础”。即“畀以有效的权力,监督政府之失职,监督财政之公开,监督外交之和战,监督对外作战军队之进退,监督官吏之贪污,监督事宜之兴革。非民众之意者得纠正之,惩罚之”。^④可见冯玉祥特别注重动员和组织民众,发挥民众的积极作用。他甚至说:“中国革命应以农工及一般劳苦大众之利益为基础,以此目的,从各方面作实际上描写与理论上之发明,力阐民主集权,而反对独裁政治。”提出把鼓励“民众自动组织义勇军”作为宣传抗日的首要内容。^⑤

① 《复罗运炎函稿(一九三二年七月四日)》,《冯玉祥选集》中卷,第753页。

② 《通告全国同胞电(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冯玉祥选集》中卷,第689页。

③ 《致李烈钧函稿(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七日)》,《冯玉祥选集》中卷,第684页。

④ 《致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监委员第一次全会电稿(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廿五日)》,《冯玉祥选集》中卷,第694页。

⑤ 《致邓哲熙、薛笃弼函稿(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廿二日)》,《冯玉祥选集》中卷,第678页。

如果再联系到冯玉祥这时期的“日记”，这一点就更加清楚了。比如在“日记”中写道：抗日“非民众起来救国不可”；“为国家雪耻复仇，非动员民众、组织民众不可。不然，用什么力量去救国呢？民众的力量，才是最伟大的、不可克服的、不可战胜的”；“我们不要忽视了民众的力量。一个真正的革命家，他始终是以民众的力量为其革命的基础的”。“抗战没有民众的力量，抗战终会失败的。抗战的失败，也就是整个革命的失败。所以我们为了抗战，为了革命，都不能失掉民众，离开民众”。^①等等。把组织、动员民众提到关系抗战胜利的高度，表明冯玉祥的思想达到了新的认识境界，成为他这时政治主张的一个鲜明特色。

最后，表明抗日到底决心。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冯玉祥的态度是一贯的，坚决的。他一再表示：“此次日本出兵东省，占领我国土，残杀我人民，闻耗之下，肝胆欲裂。凡有血气之伦，应急投袂而起，同仇敌忾，雪此奇耻。况（玉祥）宿以反帝国主义为志，救国之事，决不后人。”^②“自东省沦陷之后，外侮形势，日趋紧急，引领东望，忧心如焚，虽远处山林，每念匹夫有责之义，则如坐针毡，不知所以！”^③又鞭策说：“吾人于此，应一本过去之精神与立场，而纠正过去之错误与缺点，对国家从远处大处着想，从慎重细密着手，以大无畏之精神与坚苦之毅力、持久之耐性、团结之巩固而努力奋斗，则将来之成功方有希望。”^④还说：“本抗日到底之主张，贯澈（彻）共赴国难之目的，

① 《冯玉祥日记》第3册，第551、559、572页。

② 《复熊希龄电稿（一九三一年九月廿六日）》，《冯玉祥选集》中卷，第653页。

③ 《致秦德纯函稿（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冯玉祥选集》中卷，第685页。

④ 《致邓哲熙、薛笃弼函稿（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廿六日）》，《冯玉祥选集》中卷，第681页。

早具决心,义无反顾。”^①疾呼:“国事日急,救亡御侮,惟在大家能有真觉悟,真决心。如人人皆存必死之志,国家自有转动生机。”^②

同样,对照一下冯玉祥“日记”,也可得到有力印证。比如写道:国难当头,“除与日寇拼命以外,别无善法,姑不问人家如何,我总应先去拼拼,为全国倡”。针对“求和论”甚嚣尘上,写道:“我则主战而不主和:战则生存,和则灭亡,未有作城下之盟,犹能保全中华民族之独立自主与争取中华民族之解放也”;“我是主战的,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我是主张抗日的,我是军人,我应当多少带一点敢死的军队,到前方去打仗杀敌”;国事万端,“以抗日为第一要事;不抗日,惟死而已。”^③等等。这些掷地有声的铿锵誓言,即便含有夸大的成分,也同样表达了一个爱国者的肝胆心肠和坚定立场。

所有这些,集中昭示,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不仅热血沸腾,“忧心如焚”,坚决主张痛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同时表现出生死以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大有“敢为天下先”的决心与勇气。表明随着事变的演进,这位立志“拼命”的强硬抗战派总会演出悲壮的一幕。

二

1932年10月7日,当日本酝酿对我国发动新的进攻时,时避居山东泰山的冯玉祥决定亲赴抗日前线,于9日抵达察哈尔省张家口。

① 《致张允荣、薛笃弼函稿(一九三二年二月廿一日)》,《冯玉祥选集》中卷,第714页。

② 《致宋哲元函稿(一九三二年二月廿六日)》,《冯玉祥选集》中卷,第715页。

③ 《冯玉祥日记》第3册,第489、575、576、578、594页。

当天,冯玉祥与李烈钧等发表通电驳斥《国联调查报告书》,愤慨表示:“同人等谨为郑重声明,挽救国难,在于积极抵抗;唯抵抗乃能表现民族求存之决心;唯决心乃能移转国际之视听,徒尔求助国联,实为民族自杀,此同人等一年来所坚持不移之信念。证之今日事实而益确。”号召说:“当此国难日亟之秋,全国民众应不忘主人地位与责任,严密监督政府,坚决为武力抵抗而奋斗,毋使暴日之铁蹄得留于中国。”^①

1933年1到3月,日军相继攻陷山海关与热河省会承德,接着向长城各口及察哈尔省大举侵犯,华北和平、津形势岌岌可危。这一连串事件,使冯玉祥更加痛恨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政策,益加感到“现在已至最后之生死关头,非速图抵抗,不足以挽兹垂亡之局”,决心“能有多少力量,即用多少力量,以与暴日作殊死战”。^②或用类似的语言表达说:“吾人此时,只有站在民族独立之意义上,抱定坚决意志,以毫不犹豫之态度,向日人反攻。”^③于是加快了筹建抗日军队的步伐。

冯玉祥组织抗日联军的方针,用他的话说就是:“一、凡为民族独立而同情于抗日者,皆为吾友,应相互提携之。二、凡为亲日辱国以阻挠抗日者,皆为吾敌,应竭力攻击之。”^④这种明显含有统一战线思想的主张,是完全符合当时形势发展需要的,也是必要和及时的。以此出发,冯一面频繁地同共产党接触,并向共产党“正式提出要求,派干部一起和他筹划组织抗日同盟军”,在他的周围

① 《驳斥国联报告书谬误之联名通电(一九三二年二月九日于张垣)》,《冯玉祥选集》中卷,第766—767页。

② 《致李烈钧、徐谦、熊克武等沪上中委电(一九三三年一月七日)》,《冯玉祥选集》下卷,第5页。

③ 《复邹鲁电(一九三三年一月七日)》,《冯玉祥选集》下卷,第3页。

④ 《致李烈钧、徐谦、熊克武等沪上中委电(一九三三年一月七日)》。

很快聚集了更多的共产党人^①，一面派高兴亚赴北平、天津同朱庆澜、吉鸿昌等人以及苏联在天津的总领事联络，以取得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朱庆澜慨然答应给以“绝对支援”。吉鸿昌高兴表示：“我是绝对要抗日的……先生不找我，我也打算去……我决心以身报国，万死不辞。”苏联驻天津总领事虽表示目前苏联不可能提供武器援助，但对冯玉祥组织抗日同盟军“绝对赞同和支持”。^②这无疑给冯玉祥以极大的鼓舞。

由于坚决主张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自山海关失守，全国知名爱国人士、热血青年以及抗日团体几乎都把希望的目光投向冯玉祥，盼冯“出山”的呼声愈来愈高。章太炎在复冯玉祥的信中就极有代表性地说：“自榆关陷后，弟私念今日可与敌人决一雌雄者，唯兄一人。”^③后又派代表龚镇洲持其亲笔函到张家口劝说，信中颇动感情地写道：“兄忍辱负重，得之天性，但求立功报国，何计委任之出谁手乎？”^④冯玉祥也说：“数月以来，平津沪粤，及各省市民众团体，信使频至，文电星驰，责以大义，勉以抗日。”^⑤

当时，南京国民党政府为了打消冯玉祥举旗抗日的念头，屡屡致电或派人请其到南京。冯针锋相对提出：“方今之势，惟有政府

① 吴成方：《抗日同盟军的酝酿和成立》。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冯玉祥与抗日同盟军》，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版，第6页。

② 高兴亚遗稿：《回忆抗日同盟军筹建初期的几件事》。见《冯玉祥与抗日同盟军》，第63—70页。

③ 原件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转引自郭绪印、陈兴唐著《爱国将军冯玉祥》，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1页。

④ 原件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转引自《爱国将军冯玉祥》，第291页。

⑤ 《就任抗日同盟军总司令职通电（一九三三年五月廿六日）》，《冯玉祥选集》下卷，第53页。

明白表示抗日决心,领导全国,庶涣散之人心可以团结,垂亡之民族不至沦亡,恐舍此而外,更无他道矣。”^①或者说:“此时国家出路,惟武力抗争之一途。倘介石先生具此决心,弟当即日南下。”^②一面致电李烈钧等人,要其在国民党中央广为联络,遥相声援。对南京、北平派来的说客,冯玉祥怒加斥责,斩钉截铁说:“民族大敌当前,我冯玉祥能退走吗?能去当一名软骨头的亡国奴吗?我冯玉祥能招三十万人,就抗三十万敌人;能招一万人,就抗敌一万!”还说:“我姓冯的宁愿死在日本人手里,也决不做软骨头的亡国奴!”^③经各方面加紧联络,到5月中旬,筹建抗日同盟军已初具规模。

5月26日,汇集到张家口的各部队和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代表召开会议,组成抗日同盟军,冯玉祥被推为总司令,在张家口正式树起抗日旗帜。

当日,冯玉祥发表就职通电,历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猛烈抨击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得寸进丈,直以灭我国家,奴我民族,为其绝无变更之目的。握政府大权者,以不抵抗而弃三省,以假抵抗而失热河,以不彻底的局部抵抗而受挫于淞沪平津……迨者,长城全线不守,敌军迫攻平津,公言将取张垣。不但冀察垂危,黄河以北,悉将不保。当局不作整军反攻之图,转为妥协苟安之计,方以忍辱负重自欺,以安定民心欺人。”在此民族危亡之秋,自当遵从民众之责望,“率领志同道合之战士及民众,结成抗日战线,武装保卫察省,进而收复失地,

① 《致上海黄郛密电(一九三三年一月廿十五日)》,《冯玉祥选集》下卷,第22页。

② 《复于右任函(一九三三年一月廿九日)》,《冯玉祥选集》下卷,第23页。

③ 冯纪法:《在冯玉祥将军身边十五年》。见丘权政编:《回忆冯玉祥将军》,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8月版,第208页。

争取中国之独立自由。有一分力量,尽一分力量;有十分力量,尽十分力量;大义所在,死而后已”。最后宣告:“凡真正抗日者,国民之友,亦吾之友;凡不抗日或假抗日者,国民之敌,亦吾之敌。”旗帜鲜明地向全国人民表明了抗日同盟军的宗旨和自己所抱志向。^①

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后,为着实现既定目标,首先在政治上、组织上实行了一系列重大措施。例如:

(一)5月27日,连颁三道通令,宣布免除苛捐杂税、释放所有政治犯、党费不得由国库开支。在释放政治犯“通令”中,特别强调:“查明所有政治犯,一律开释,以伸民气,而扩大抗日战线。”^②

(二)6月15日,召开第一次军民代表大会,通过民众抗日同盟军纲领、军事问题、财政政策等决议案。强调同盟军的性质为“革命军民之联合战线”,否认一切卖国协定,反对任何方式的妥协,决心以武力收复失地。并确定了民众抗日同盟军上层序列及军一级的主要领导人。冯玉祥还以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名义致电全国,反对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的“停战协定”,指斥说:“溯自九一八以迄今日,现政府有力当局,实始终站在不抵抗主义之立场。虽政策之名词,表现不一;而政策之内容,实质未变。有力当局蔽于私利,坚主安内先于攘外。究其实则为真对内,假抗日”。“夫大敌当前,不竭尽全力而怀二志,安得不败?一败之后,即迅舍战而求和”。进而警告说:“目下平津被围,察绥危殆,此时言和,等于投降,投降等于亡国,主持妥协之有力负责当局,必为民众所共弃”。^③

① 《就任抗日同盟军总司令职通电(一九三三年五月廿六日)》,《冯玉祥选集》下卷,第53—54页。

② 《通令释放政治犯(一九三三年五月廿七日)》,《冯玉祥选集》下卷,第56页。

③ 《反对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停战协定通电(一九三三年五月廿八日)》,《冯玉祥选集》下卷,第58页。

经过一番整顿、强化与组合,6月22日民众抗日同盟军出兵攻克康保,打响收复察东失地第一枪。接着,7月1日收复宝昌。同日,分三路围攻多伦。当时防守多伦的有日军茂木骑兵旅3000余人及伪军李守信部。战斗异常激烈。冯玉祥亲发电报,勉励将士说:“今日之事,近则俱生,退则俱死。”“为国而死,其死也荣。忍辱偷生,虽生实死。”并表示:“粉身碎骨以报国者,则祥愿以之自勉也。”^①在冯的激励下,经连续浴血奋战,民众抗日同盟军终于7月12日将多伦收复。在以上诸战役中,共击毙日伪军1000余人,1600余名抗日同盟军官兵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民众抗日同盟军收复察东失地,特别是攻克察东重镇多伦,给全国人民以巨大的振奋。正像一支“张垣倡义”歌中所唱的:“好男儿,壮志坚,抗日义旗举张垣。忠勇毕聚同盟立,誓以铁血抒国难。力虽薄,义愤伸,收复察东克多伦。驱寇雪辱非不能,兴起兴起我国人。”^②各地抗日组织和团体纷纷致电“表示敬仰与激励”。就连不满蒋介石一味妥协而主张抵抗的国民党人,也积极奔走,多方给以声援。例如时在上海的李烈钧,得知民众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即致电祝贺,称赞冯玉祥“不贪高官,不惜性命,惟仁是求,惟义是赴,旬日间传檄收复四县,今且血战攻克多伦,举百万方里已失之领土,首收复之,捷报飞传,闻者雀跃。公等之业诚伟矣!”还说:“弟亦深知公之为公者,必有更进之伟业,为民族光也”。^③同时与王法勤、朱霁青、邓家彦、傅汝霖等联名致电林森、蒋介石、汪精卫及国民党各中委,要求授冯玉祥“以重权,使当大任”。电中并特别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

② 《抗日歌·张垣倡义》,《冯玉祥与抗日同盟军》第245页。

③ 《致冯焕章先生电》,拙编:《李烈钧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859页。

强调:当“强敌侵袭,山河破碎”,“冯焕章同志愤国势艰危,倡义军之同盟,图抗敌于张北,其力虽薄,其志可钦,精忠卫国之心,皎然共睹”。因此“政府宜察其忠忱,嘉其勇毅,补充其军旅,俾得其一意练兵,保障边陲”。^①还一再表示“弟等自当联合诸人,再申正论,为历史略存正气也”。^②又发表谈话,称冯“始终抱定抗日救国之大志”,“对冯之抗日,自属一致敬仰同情”,至于援助问题,无论精神或物质方面,“尤不待言也”。^③对冯玉祥及民众抗日同盟军一直持支持的态度。

然而,与全国人民的愿望相反,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则反其道而行之,对冯玉祥举旗抗日千方百计加以反对、破坏和扼杀。

(一) 诋毁抗日同盟军的英勇事迹,减弱抗日同盟军在全国的影响。7月3日,蒋介石密电汪精卫,不仅诬蔑冯玉祥益加“赤化”,而且露骨地攻击说:“冯有今日,固早预料,今其赤色旗帜已益鲜明,使中外皆易认识,不为所蔽,则中央处置更易。”^④并不顾起码事实,污蔑“多伦方面本无日军”,抗日同盟军“并无用兵,亦未发生激战”。^⑤汪精卫也随声附和,喧嚣说: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并无此等事实”^⑥,多伦“乃取之伪军之手,此等傀儡,何足一击”。甚而说“若因此而遽以为吾国现有兵力,足以收复失地而有余,则徒使古北口、喜峰口、冷口一带战死之将士,溅泪于地下而已”^⑦,公

① 《李烈钧文集》,第702页。

② 《李烈钧文集》,第859页。

③ 《在上海与新声社记者的谈话(一九三三年七月十六日)》,《李烈钧文集》第704—705页。

④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转引自《爱国将军冯玉祥》,第298页。

⑤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转引同上。

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转引同上。

⑦ 《汪精卫致李济深、陈铭枢电(一九三三年七月十八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转引同上。

然为国民党政府在长城抗战中实行不抵抗进行辩解。

(二) 不惜以高官重金收买冯玉祥的部属或愿与冯合作的将领,从内部削弱抗日同盟军的实力,阻挠抗日同盟军的进一步扩大。汪精卫在致蒋介石密电中,就毫不掩饰地说拟以冯的部属“孙殿英主持察政”。^① 结果在蒋介石等的利诱下,冯占海等先后脱离抗日同盟军而去。而对坚持抗日终不为收买者,如第五路军总指挥邓文,则出以残忍暗杀手段。

(三) 进而派大军对抗日同盟军进行武力镇压。从7月初蒋介石密电何应钦“速筹军事之彻底办法”,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一面“进兵”、一面派人劝冯玉祥取消民众抗日同盟军名义,到国民党北平军分会命令庞炳勋、关麟征、冯钦哉各部自7月8日起开始行动,到何应钦亲与日土肥原贤二密商要日、伪军协助夹击抗日同盟军,到蒋介石和汪精卫7月28日联名致电冯玉祥提出最后四项通牒,再到何应钦增调五个师参加“围剿”,7月底入察哈尔国民党军队已达16个整师,15万余人,铁甲车8列,飞机18架,并在怀来设有机场,对抗日同盟军形成了层层包围。致使张家口成了一座孤岛,“粮秣、服装已感缺乏,现金则更无法筹措”,“窘困达于极点”。^②

(四) 对抗日同盟军断绝交通,实行经济封锁。

在蒋介石南京政府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下,孤立无援的抗日同盟军纵然对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倒行逆施极为不满,纵然怀抱满腔抗日热情,也不得不宣告“对察省抗日军事作和平结束”。同

^① 《汪精卫致蒋介石密电(一九三三年六月三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转引自《爱国将军冯玉祥》,第299页。

^② 黄文焕1933年7月2日致北平军分会情报,转引自宋连生《冯玉祥解散民众抗日同盟军原因初探》,《河北师院学报》1988年第4期。

时冯玉祥亦认为,此时与南京政府刀枪相向只能对日本有利。透露出一颗不计个人得失而以民族利益为重的赤诚之心和坦荡胸怀。

当然,也应看到,抗日同盟军难以坚持长久尚有两个因素。一是自身的严重不足,也就是内部组织比较复杂。二是寄希望于西南实力派落空。当抗日同盟军酝酿举旗时,与蒋介石矛盾日加激化的西南各省曾致电表示,誓愿作抗日同盟军的“后盾”,并答应接济饷械。积极酝酿倒蒋的胡汉民也连电冯玉祥,表示“南方同志精神团结,意志不移,遇有举措,必竭诚襄助”;抗日同盟军举义后,还提出“西南抗日军亦积极北进”,“使西南兵力推入长江”。^①此为冯玉祥“最期望而亦为最指望者”。但自抗日同盟军树旗抗日以来,“终见其文电卒未见有任何成效”。这不能不成为抗日同盟军考虑能否继续坚持的一个重要方面。

8月14日凌晨4时半,在宋哲元等陪同下,冯玉祥乘夜车悄然离开张家口。行前,他断然拒绝蒋介石和汪精卫邀他赴南京“共商大计”。

三

冯玉祥当然不是九一八事变后最早起而抗日者,在此之前已有抗日武装在各地兴起,如著名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等。但就其领导者地位、声望和号召力都难以同冯玉祥相比。因而,民众抗日同盟军虽坚持不到三个月时间,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不单单表现在军事上一举收复察省失地,打破了日本侵略者不可战胜的神

^① 转引自《冯玉祥与胡汉民——胡汉民晚年往来函电考释之三》,杨天石著:《海外访史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46、348页。

话;更重要的在政治上用实际行动打破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真正体现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英雄气概和坚强意志,给全国人民以巨大的振奋和鼓舞。对于这一点,冯玉祥有着深切的认识。他总结说:“虽因种种环境关系,不容许我武力收复东北的夙愿。但是,在这次光荣的民族战争与血的经验中,越发证实我一向所坚持的铁的原则:即饬绌械窳的中国军队,苟能勉以大义,动以血性,非不能战;亦惟有对日慷慨悲壮的抗战,才是我们死里逃生的唯一的途径!”^①

冯玉祥演出民众抗日同盟军精彩一幕,根本上如上所述是其九一八事变以来坚持抵抗立场的必然结果。但如果扩展视野,从其一生的某些方面比如对日态度观察,也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

冯玉祥一生勤奋好学,且有坚持写日记的良好习惯。目前整理出版的5册,时间自1920年11月25日至1940年12月31日。仅九一八事变前,谈及日本的即占有相当比重。虽然为冯本人的说法,但总体上可看出其基本意向所在。就内容而言,大体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 希望中日友好,但决不能损害国家主权。

早在1925年4月6日,冯玉祥与日本驻张家口领事谈话中就指出:如欲实现中日亲善,不能“口头空谈”,必须真有诚意。但实际上,“日本当中国大病之时,不惟不援助之,且加一大打击。中国人因而恨之刺骨,无怪不能合作也”。因此,“日本国民,若不督促政府,将此种假面具揭去,万万不能合作也”。^②在以后的谈话,类似的意思表达得越来越明确。比如:

同年5月3日,与日本驻京津参谋长谈话称:“中日两国种族、

① 《〈察哈尔抗日实录〉序(一九三三年九月十八日)》,《冯玉祥选集》上卷,第122页。

② 《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47页。

历史、文字、制度无不相同，彼此实有休戚与共，祸福相同之谊。中国若亡，日本又岂能独存？所望贵国识时贤豪，与吾等真诚携手，直接以维持东亚之和平，间接以促进世界之大同。”^①

6月2日，与来访田中代表谈话称：“中国与日本同文同种，共存共荣，本有唇齿相依之势，实有相互亲善之要，但愿开诚布公，切实提携。若口是心非，甚无当也。或谓余排外，实则大误。余无论对何国家，均以朋友相待，无少轩轻，但不能因私而忘公耳。”^②

6月19日，与来访日人谈话称：“我与日本原本亲爱，不过，对有损国权之处，仍不能不坚持力争，或即以此自我排外，未免错误。诚以友谊固不可不崇，而人格更不可不讲也。”^③

12月4日，与来访田中代表谈话称：“中日唇齿相依，关系密切，日亡中国固不能单独存在，果不幸而中国亡，则区区三岛，恐亦不能屹立，故中日实有亲善之必要。惟中国为民主国，深望日本与合乎民意之人物亲善，不可专与军阀亲善。”又说：“余为主张和平之人，以为中国此时，极应亲日联俄，且以为中日亲善，须与国家、人民谋利益，决不可为个人谋利益也。”^④

到1928年6月，在一次与日本记者谈话中更直截了当地宣称：“余对日本极希望早日取消不平等条约，使中日邦交日进亲善”。“若同种同文之国家，竟维互相欺压，互相仇视，则一切利益，惟有坐听欧美抢去而已”。因此，警告说：“惟吾所希望于日本国民者，不要心怀仇视，日图侵略。亟应彼此亲善，共存共荣耳。”^⑤

（二）对日本扩张侵略野心的揭露与抨击。

① 《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60页。

② 《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70页。

③ 《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82—83页。

④ 《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142—143页。

⑤ 《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477—478页。

冯玉祥很早就对日本的扩张野心有所认识和警惕。1922年9月6日在一次讲话中,他敏锐地揭露说:“欧战以后,竟言民族自决,吾国之人,为其所愚,盖民族自决之提倡,其中有一个亡国灭种之手段在焉。现在日本有书,名曰日蒙同新。内云:东亚始于一族,祖有子二,长子单传,为中国之先祖。次子双传,一为蒙古始祖,一为日本始祖。所以中国虐待蒙古,日本以血统关系,不能坐视。其荒谬狡猾有如此者,民族自决之声浪震全球矣。”进一步抨击说:“倡此言者果何所为乎?非欲亡人之国、灭人之种耶?”^①以后还多次指斥“日本将侵我内蒙”^②;日本当局“不愿中国和平”^③;
“日本政府,外则仁义,心则虎狼。吾国五岁以上之童子,无不知之”。^④告诫将士:“吾军当此危难交迫之秋,应如何自惕自勉。”^⑤

1928年5月初,日本帝国主义出于维护其在山东权益的卑鄙目的,乘蒋介石国民党二次“北伐”之际,悍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同全国人民一样,冯玉祥极为愤慨。6日,即在讲话中指斥“日本田中,丧心病狂,出兵济南,阻碍北伐”,勉励手枪队、将校队“彻底觉悟,共捍国难”。^⑥两年后,即1930年5月3日又写道:“日人杀我同胞于济南者,二年于兹,不但耻未雪,而国人且将忘之矣!不但国人忘之,即自谓革命者亦将忘之矣,呜呼!”同时令人筹开“五三”国耻纪念会。^⑦

(三) 对日交涉态度要坚决,要敢于针锋相对。

① 《冯玉祥日记》第1册,第207页。

② 《冯玉祥日记》第1册,第275—276页。

③ 《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35页。

④ 《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47页。

⑤ 《冯玉祥日记》第1册,第276页。

⑥ 《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458页。

⑦ 《冯玉祥日记》第3册,第193页。

1925年4月6日,日人滨野未太郎来访,探询冯玉祥对中日合作的看法,冯断然表示说:“中日合作则可。不然若杀不尽中国人,决不能让日本占领中国也。”^①这是冯玉祥对中日关系的基本方针和立场。

在以后对官兵的讲话中,冯玉祥还特别提到他亲自处理的两桩纠纷案。两桩纠纷案都发生在其任湖西镇守使职内。一是日本士兵蛮横不接受检查,与冯守城卫兵发生冲突,双方均被刺伤。事件发生后,日领事坚持要求以日本法律判中国士兵徒刑二年。冯玉祥厉声斥责说:“汝此言真应掌颊,中国未亡国,为何适用尔日本法律!若依我国法律,刺伤日人,还得赏洋五元。”当面将日领事顶了回去。二是1919年常德学生为纪念“五七”国耻日举行示威游行,有学生出于义愤将一日本人商店捣毁,冯玉祥随即派兵守护,以待交涉。但日领事却不顾事实,“力称损失若干,非赔偿不可”。冯玉祥则“始终据理力争,不少屈”。在冯玉祥的坚持下,此两件纠纷案最后都和平了结。所以,冯玉祥讲了两案过程后,有针对性地强调说:“由是可知,对外交涉,只能据理力争,自无失败之理。而吾国一般外交人员,本其患得患失之心,一遇交涉,辄畏外人如虎,惟外人之命是听,赔款道歉,丧权割地,辱国实甚,殊可痛惜也。”^②议论虽不无偏颇之处,但批评还是中肯的。

冯玉祥深知他坚持反日必遭诋毁。例如日帝国大学某教授讲演公开称:“蒋承认西原借款,并与日订约,故蒋极易与;至冯某一向反日,故我国应助蒋打倒之。”^③但冯毫不动摇。1929年7月20日,他与人谈话坦然说:“外间多目余为排日派,诚然,因余对于

① 《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47页。

② 《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431—432页。

③ 《冯玉祥日记》第3册,第34页。

其帝国主义之侵略野心，誓志反对到底。”^① 到1931年5月底，亦即“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几个月，冯玉祥因此受到的攻击愈烈，其决心亦愈坚决，并以孙中山、黄兴乃至达尔文、马克思相勉励。他写道：“田中等悬赏征诽谤余之诗文，近日国人亦有重价找日人作书者。我以为中山先生、克强先生均被袁氏找人作小书骂过，并无损于孙、黄。所以只须自己立身正大，便可毫不惭愧，疯犬狂吠，听之而已。即如达尔文、马克思均曾被骂为活妖怪，究有何害？况日人原应当骂我，因我曾反对日帝国主义无所不至也。”^②

(四) 勿忘二十一条“国耻”。

这方面谈及最多，也最为愤慨，既有言论又有行动，姑择其要者详列如下：

1922年10月10日，出席“国庆纪念大会”讲话称：“二十一条，民国成立后之苛刻条件也，竟限四十八小时允诺，等于城下之盟。”“二十一条通牒，青岛久占不归，日人欺我甚矣！乃在巴黎和会中，列强反援助日本，压抑吾国，正义何在？公理何存？吾等军人应以不能雪国耻、复失地，而坐糜饷项为辱，千万勿以食民脂，衣民膏，而害国殃民为荣。”^③

1923年4月27日，传令部属：“五月七日为吾国奇耻大辱之纪念日，各团营门外须扎松牌，中间大书‘国耻纪念，万不可忘’八字，左右书二十一条，是日唱国歌并对国旗行敬礼，耻之于人大矣哉。知耻近乎勇。我国人近来抵制日货，与日本经济上一重大打击，而北京人之动作云为，无在不显出亡国奴气象，毫无振奋精神，

① 《冯玉祥日记》第3册，第16页。

② 《冯玉祥日记》第3册，第428页。

③ 《冯玉祥日记》第1册，第231页。

是可忍孰不可忍耶!”^①同年5月7日,与部属同食蜀黍面馒头,馒头上一律印红字“勿忘国耻”四字。并讲话云:“日人以我中国无人,故敢蛮横如此,我们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争生存,当努力奋斗,以雪此耻。否则将蹈韩国之覆辙,虽欲如今日之开会亦不可得矣。”“吾人雪耻救国只用一个死字已足。语云:一夫拼命,万夫莫敌。苟以四万万人怀必死之心,以抗日本,吾知今日之耻必能雪也。”^②同年5月20日,讲话称:“五月七日,本军在南苑开国耻纪念会。是晚,四十四团官兵由南苑回北京时,手持许多国耻纪念旗。闻日公使谓我排外,然则必须我军俯首贴耳,听彼解散缴械,方不为排外耶?诸君思之,危乎不危?”又谓:“某日人问我青年会中为何不悬日旗,我答自从民四‘五·七’以后,中国商店中早已无卖日本国旗者。”^③

1924年5月7日,上午召开“国耻纪念会”,讲话称:“今日集会,并非庙会,实是将作亡国奴以前之聚哭日期。”接着令人宣读二十一条。之后发表讲话要“男女老幼勿忘国耻”,率众高呼“勿忘国耻”。下午同全体将士拜国旗、聚餐,每枚糈粮上均印“勿忘国耻”四字。^④

1925年5月12日,与来访日人谈话称:“君希望中国和平统一,盛意极感。然二十一条,实为我国和平统一之一大障碍物,甚盼督促贵国政府,早将取消也。”^⑤同年6月11日,讲话称:“昔吾在常德时,北京学生发起‘五七’国耻运动,国人多谓学生徒事滋

① 《冯玉祥日记》第1册,第323页。

② 《冯玉祥日记》第1册,第339页。

③ 《冯玉祥日记》第1册,第360—361页。

④ 《冯玉祥日记》第1册,第558—559页。

⑤ 《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63页。

扰,我则以为血性所激,事出至诚。”^①

1926年5月7日,在俄国,出席“华人共济会”,纪念“五·七”国耻。^②同年12月26日,讲话称:“二十一条为中国之奇耻大辱,此等国耻,非雪不可。”^③1927年2月27日,讲话称:帝国主义乃侵略主义,“侵略下之中国已沦于次殖民地之地位,而日本之二十一条尤为中国之致命伤”。^④同年4月25日,讲话称:“按二十一条所载,如中国军警由日本训练,财政由日本管理,铁路由日人建筑,即此数项而论,已足亡国而有余。诸位皆爱国健儿,闻之能不肝肠寸断耶?”^⑤同年5月9日,讲话称:“今日是袁世凯屈服日本,承认其二十一条亡国条约之纪念日,同时又为总理纪念周日。不平等条约尤其是二十一条,足制我国之死命而有余,而总理一生之志愿,其对外者,即在取消不平等条约,尤其是挣断此二十一条之铁锁链,望各秉承总理遗志,勿忘‘五·九’奇耻。”^⑥

1928年3月26日,讲话称:“日本以四千万人之国家,强迫我国承认其二十一条,将我国之军警、财矿、交通各权,均攫诸掌握,视同属国,可恨孰甚!可耻孰甚!”^⑦

1931年5月7日,同友人开会,讨论“五七”国耻之事,并分赠茶食各一包,上写“五七”不可忘的事:“一、东省火车压死人,压死人的时候,人民仍须赔错,否则即治以重罪及妨碍交通罪。二、台湾人民起来,反抗日人,被日人杀死甚多之事。三、日本国内染织

① 《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78页。

② 《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176页。

③ 《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273页。

④ 《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299页。

⑤ 《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324页。

⑥ 《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329页。

⑦ 《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436页。

工人,有二百余人饿死,同盟及宣言事。”^①

单就以上所列,可以看到:(一)为使全军将士不忘国耻,冯玉祥几乎于每年5月7日或9日即1915年日本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袁世凯被迫接受日本政府“二十一条”之日都举行纪念活动。这种数十年坚持如一的做法,清楚表明日本政府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在冯玉祥的心目中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创伤。正如他所斥责的:二十一条“实为我国和平统一之一大障碍物”,“二十一条为中国之奇耻大辱”,它“足制我国之死命而有余”,中国争取取消不平等条约尤其要“挣断此二十一条之铁锁链”。(二)为使全军将士不忘国耻,于举行纪念活动时除了扎松牌、挂“国耻纪念,万不可忘”横幅、书写或宣读“二十一条”以及“唱国歌并对国旗行敬礼”外,还特别在食用的馒头或糠粮上印上“勿忘国耻”四个红字。这当然不是摆样子、搞形式,而是作为教育士兵、激励爱国热情的重要一课,或者说必修课。说明冯玉祥和他所带领的军队固然不可能完全摆脱当时的历史政治环境,时常卷入新旧军阀的混战,但在关系国家利益、谋求民族独立这一点上还是有着自觉意识的,也是坚决的。(三)不忘国耻,正是为了雪耻。正像冯玉祥所说:“耻之于人大矣哉”,“知耻近乎勇”。所以以此勉励全军将士:“日人以我中国无人,故敢蛮横如此,我们为争人格,为民族争生存,当努力奋斗,以雪此耻”。“此等国耻,非雪不可。”

由此联系起来看,冯玉祥在“九一八”事变后的表现就是毫不足为奇,而是很自然的了。

(作者徐辉琪,1941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刘兵)

^① 《冯玉祥日记》第3册,第415页。